

批评与想象

陈思和 / 著

新 / 人 / 文 / 论

纪念版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批评与想象

陈思和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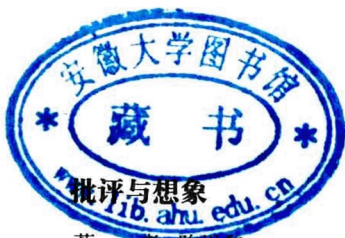
批评与想象 / 陈思和著. —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9

(新人文论丛书书目)

ISBN 978-7-5675-2542-9

I. ①批… II. ①陈…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史研究 IV. ①I209.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19253号



著者 陈思和
总策划 李庆西 黄育海
项目编辑 许静 陈斌
封面设计 高静芳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 200062

网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兼传真)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刷者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890 × 1240 32开

印张 12.25

字数 250千字

版次 2014年11月第1版

印次 2014年11月第1次

书号 ISBN 978-7-5675-2542-9/I · 1249

定价 48.00元

出版人 王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再版序言

李庆西 黄育海

许多年以后，我们才意识到，一九八四年冬天在杭州举行的小范围座谈会给中国文学发展带来何等重要意义。许多人把那次座谈会称作“杭州会议”，陈思和教授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也专门提到了那次会议。其实它有一个更正式的名称，叫做“新时期文学创新座谈会”。现在看来“创新”这个字眼似乎平淡无奇，可是在当时的语境中却有着相当实际的理论指向，也即如何突破带有历史主义框架的“工具论”的神道设教。

会议的三位主要策划人茹志鹃、李子云、周介人，时为上海作家协会和《上海文学》负责人，他们之所以选择在杭州举办会议，其中有一个原因是浙江的作家和出版单位对文学新思潮开始有了深度介入。当时我们二人是浙江文艺出版社的年轻编辑，评论界正在发生的变革引起我们极大兴趣，本社刚刚出版了青年学子许子东的《郁达夫新论》，我们亦将目光投向上海另外两位青年评论家吴亮和程德培。我们开始意识到，那些具有颠覆性的话语方式将整个儿地改变文坛面貌。于是，出版一套“新人文论”丛书的构想渐渐浮现

在我们脑子里。在八十年代中期，京沪以外的地方出版社能够接触的作者资源还相当有限，正当我们苦于书稿难觅之际，在家门口召开的“杭州会议”不啻送来一个极好的机会。

作为会议合办方浙江文艺出版社（另一合办单位是杭州市文联）参会人员，我们全程聆听了会议座谈，有幸见证了那场叙事话语革命的头脑风暴。也许，寻根文学发轫，先锋小说崛起，都可以追溯到当日的讨论。毋庸置疑，那是八十年代最重要的文学聚会之一。当然对我们来说，一项实际的收获就是结识了众多思想敏锐的作家和评论家，使我们构想中的“新人文论”丛书有了明确目标。记得参加会议的有三十余人，其中作家有茹志鹃、李陀、郑万隆、阿城、陈建功、韩少功、陈村、李杭育等十几位，而评论家阵容亦颇耀眼，有李子云、徐俊西、周介人、鲁枢元、黄子平、程德培、蔡翔、许子东、陈思和、吴亮、季红真、南帆等人。我们的组稿对象是那几年刚刚崭露头角的青年评论家们，后来进入“新人文论”阵容的作者差不多有一半都在那次会上。在“新人文论”之外，我们还趁势组约了作家韩少功的一本文论集。会议空隙中的几番忙碌，使我们这套丛书俨然有了像样的规模。

“新人文论”丛书融合了文学批评、文学史与理论探讨几方面内容，对象就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包括“新时期文学”）。在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陈思和提出“中国新文学整体观”概念之前，我们这套丛书的基本构架已经按照打通现当代的思路来做了（九十年代以前，现代与当代文学尚分属不同学科），这是我们后来感到颇为得意的一点。其实，并非因为我们亦同样具有与那些研究者相似的学术眼光，而是当时的理论语境

给予我们这样的启示，我们感受到的批评与研究潮流本身就是重新寻找现代性的一个“有机的整体”。当然，这项工作具体做起来自有分工，当时我们二人兴趣更多集中在与当代文学相关的理论问题，丛书中侧重现代文学的几种，大多是我们尊敬的前辈编辑铁流先生的劳绩。

自一九八五年至一九八九年间，“新人文论”丛书先后出版了以下十七种：吴亮《文学的选择》、程德培《小说家的世界》、许子东《郁达夫新论》（增订版收入丛书）、季红真《文明与愚昧的冲突》、周政保《小说与诗的艺术》、刘纳《论“五四”新文学》、黄子平《沉思的老树的精灵》、南帆《理解与感悟》、赵园《论小说十家》、李黎《诗与美》、蔡翔《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精神漫游》、王富仁《先驱者的形象》、陈平原《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殷国明《艺术形式不仅仅是形式》、蓝棣之《正统的与异端的》、王晓明《所罗门的瓶子》、李劫《个性·自我·创造》。本来计划中还有陈思和一种，后来因故搁浅，一直是我们十分遗憾的事情。

概而言之，这套丛书是八十年代初开始活跃于文坛的青年学者和批评家的一次集体亮相，映照三十年前文学观念嬗变的思想大潮。我们至今认为，近世以来在中国人撰写的文论著作和批评文章中，此前尚未有过这样的精神视野和理论探索之勇气。因而，这套丛书的出版，对于文艺学研究，对于当代创作乃至五四以来的新文学研究，都有着持续而深远的影响，随着时间推移愈显其原创文本的经典性。

现在看来，这套丛书也许尚有某些不足，当时作为“新人”的作者大多处于学术起步阶段，日后他们对自己的学术观点乃至整个

研究路径可能有过重大调整，甚至亦难免“悔其少作”的自谦心态。然而，已经成为文学史记忆中的这套丛书，如今仍然以其原初的文学理想昭示着可贵的探索精神。三十年过去了，当日的种种话题有些已经成为理论共识，有些则布下了日后形成学术歧见的“草蛇灰线”。当文学乃至人文精神式微之后，重读当年“新人”之作，自有“温故而知新”的精神感悟。我们认为，“新人文论”之重要性大抵可归纳为这样三点：

一、首先是理论突破性。丛书作者突破了将文学作为意识形态工具的思想禁锢，关注人性和人的精神世界，确立了文学的主体价值。在努力探寻艺术规律的同时，引入其他人文学科理论因子，改变了以往文学批评的单一话语方式，并将研究目光导向文化 / 文明范畴。

二、新一代评论家和研究者的成功崛起，是八十年代思想解放在文学领域的标志性事件。这个新的群体势必带来一种多元化局面，打破了长期以来科层化的文艺研究部门的政策性垄断。这些作者将个性化思维代入五四新文学以来累积的问题意识，亦改变了旧有的创作研究格局，昭示着体制性文艺学开始走向瓦解。

三、印证了“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时代风气。这套丛书有十三种是作者出版的第一本书（仅王富仁、赵园、王晓明、李劫四种为作者第二本书）。经历了三十年岁月磨砺，当初的“新人”如今绝大多数成为国内评论界和学术界的领军人物。其实，绝非编辑者有多么高明的人才眼光和学术前瞻性，八十年代绝对不像现在这样崇拜权威与名家，那是人文领域难得的容纳创造性思维的年代。

鉴于上述认识，我们觉得有必要重新出版“新人文论”丛书，

不仅是一种纪念，亦是为着赓续三十年前的创造——三十年前的一九八四年，难道不是仍给我们留着思想的门缝？一九八四，在乔治·奥威尔的书写中是思想禁锢的标识，而在我们的记忆中却是某种自由叙事的开端。

遗憾的是，由于时间与技术原因，这次再版未能联系到初版十七种的全部作者，其中周政保、李黎、李劫三种只能暂付阙如。另外让我们感到高兴的是，原先因故未出的陈思和一种，终于能够得以补入。因而，这次再版的“新人文论”丛书是十五种。再版的各书除个别有所增补之外，我们只订正了文字舛误，另外由作者本人加写了一篇再版后记，其他一概按初版原貌刊印。

丛书再版得到十五位作者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热忱支持，以使我们的想法再度得以实施，所以在此附记一笔，以申谢悃。其他要感谢的人士很多，不能一一具述。

二〇一四年九月记

序：坚实、热忱的求索者

陈骏涛

—

近几年，关于对中国新文学（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必须进行宏观整体研究的呼声颇高。最早作出这种构想的是北京的黄子平、钱理群、陈平原诸人。他们在一九八五年发表的《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一文（《文学评论》一九八五年第五期），在国内第一次公开亮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旗号，主张把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这三个彼此分立的命题打通起来，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和发展系统来研究。在当时，这是一种相当新颖的文学史观。作者的过于概略和简约的论述（当时也只能如此）尽管使人不太满足，但它所展示的宏阔图景和新颖构想，确实使人一新耳目。这个命题的提出，不仅表明研究者试图打破原先中国新文学研究中的孤立的格局，而且显示了研究者同时具备的两种眼光：横向上，他们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纳入到世界文学发展的总体框架中来考察；纵向上，他们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向中国现代文学转变、过渡和发展的过程来考察。同时具备这两种眼光，就有可能使研究工作上升到一个较高的

层次。

对中国新文学进行宏观整体考察的命题提出之后，批评界和研究界的一些朋友曾经担心这种过于宏观的考察可能会削弱人们对具体材料的研究，助长研究工作中特别忌讳的一种“大”而“空”的倾向；在实际工作中，也确实出现了一种脱离微观考察的“宏观”研究，脱离实证分析的“综合”研究的倾向。显然，这是与提出这一命题的研究者的初衷相悖的。

从一九八五年“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命题的提出，到一九八八年上海的陈思和、王晓明、李劫等人“重写文学史”命题的提出（分别见《上海文论》一九八八年第四、五期，《北京文学》一九八八年第七期），这是一个发展过程。“重写文学史”当然还是一个宏观的命题，它要求对旧的文学史框架进行重新审视，虽然并不是对旧的文学史写法的完全否定，但无疑是对新的文学史写法的积极倡导；从逻辑上说，它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命题是相通的，它都要求研究者具有一种新的视野，以现代意识来审视历史，同时又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重写文学史”已经不仅是从文学史的框架上提出问题，而且开始着手对重要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文学思潮进行重新评估，这说明研究者的思考具体化和细密化了。当一种新的文学史观确立后，重要的是必须运用这种新的思想去对纷纭繁杂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文学思潮进行具体研究，作出既不同于前人的，又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评估；实际上，新文学史观的确立从来就离不开对具体问题的研究，否则，新文学史观岂不就成了高悬于空中的楼阁了吗？

陈思和是从研究具体作家作品起步的。他最先研究的是巴金。还在做学生的时候，他就和他的同学李辉潜心于研究巴金，从《文学评论》发表了他们的第一篇论文以后，就一发而不可收，接二连三地发表了一系列研究巴金的文章，终于集腋成裘，编就了一本二十多万字的《巴金论稿》。这对于刚刚离开大学校门的年轻人来说，实在是难能可贵的。这本书的主要特色，正如贾植芳先生所言：“是把自己的论题建立在充足的资料基础之上，在吸收和借鉴了前人和今人的研究成果的同时，开拓了自己的研究课题和中心。”（《巴金论稿·序》）对具体作家作品的研究，培养了陈思和在科学研究中至为重要的一种作风：“把自己的论题建立在充足的资料基础之上”，不作无根据的推想和主观的臆断，注意于扎实的、艰苦的分析和研究。

陈思和本来可以顺顺当当地在现代文学领域里继续耕耘下去，凭他的勤奋和扎实，是不会没有好成绩的。但是，他却为自己树立了一个新的标杆，选择了一条较之先前的研究远为艰难也远为开阔的目标：把现当代文学打通起来，将中国新文学作为一个整体、一个系统来研究，探求其内在联系和发展规律。从一九八五年开始，陈思和就着手对中国新文学的整体研究。他的这一工作几乎是与黄子平等人的同步的，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还可以说，他的工作是对黄子平等人的不足的一种补充，使“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过于概略和简约的构想具体化了（当然，黄子平等人的后来也进一步发展了这一命题），落实到对文学史上的一些具体问题（仍然是从宏观角度）

的研究。这些具体问题在陈思和那里就演化为如下的论题相继问世：《中国新文学发展中的现代主义》、《中国新文学发展中的忏悔意识》、《中国新文学发展中的现实主义》、《中国新文学发展中的圆形轨迹》、《中国新文学发展中的浪漫主义》、《同步与错位：中西现代文学比较》……

陈思和的这一系列文章对中国新文学运用了“整体观”的视角，而其所采用的方法则被他自己命名为“史的批评”法。关于这种批评方法，他自己作过如下的解析：“与其说是力图沟通中国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界限，还不如说是试图用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来重新认识新文学史上的某些既定的偏见；站在今天的高度来重新认识、评价以往的文学现象，并在历史的观照下，推进当代文学以至文化的进步。”（《方法、激情、材料》，《书林》一九八八年第七期）因此，作为这种方法的灵魂的，则是一种现代意识——一种当代人的文化眼光和批判激情，唯其如此，才能突破既定的结论，对问题作出新的解析。我在陈思和的许多文章中都读出了这种眼光和激情。

陈思和之引人注目，不是始于他的巴金研究，而是始于他对中国新文学的整体研究；但是，如果没有早先几年在巴金研究中所锤炼出来的那一套实打实的硬功夫，那也难以达到如今这样的成绩。在文学研究领域，才气和灵气固然重要，但单靠才气和灵气，没有扎实和艰苦的工作，那是难以有真正的学术建树的。当然，如果陈思和仅仅停留在前几年巴金研究的水平上，而没有上升到对中国新文学发展的整体把握，那么他很可能仍然被淹没在同一层次的许多研究者中而难以崭露头角。

三

陈思和的研究涉及到二十世纪中国新文学发展中的诸多问题。概略地说，主要涉及到如下三个方面的问题：一、中国新文学发展中的“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关系；二、中国新文学发展中的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关系；三、中国新文学发展中的民族文化和现代意识。现在还不能说，陈思和对上述问题的探讨已经十分深入，达到了很高的学术层次；但至少可以说，他已经对这些问题作了十分认真、富于新意的研究，这些研究是远非空泛，而是十分实际的。

陈思和有一个十分突出的观点是，非常强调中国新文学的“现实战斗精神”——一种为呼唤现代文明，为改变落后现状而紧张地批判社会现实，热忱地干预当代生活的战斗激情。这种战斗激情为鲁迅等先行者所开创，为胡风等后继者所延续。迨至新时期文学中的一批年轻作家那里，这种“现实战斗精神”形成了新的变体：“现代战斗意识”。与上辈人的乐观和自信不同，这一辈年轻作家是孤独和怀疑的，在文学追求上则表现出种种的放纵和偏颇，但他们所关心的依然是社会生存问题，因此在本质上与“现实战斗精神”是相通的。这就是陈思和的基本观点。

上述观点却使我联想到陈思和自己也是一个面对现实、热忱地关注当代生活、富于生活激情的人，虽然这种激情深藏在他温文尔雅的外表的背后，但我从他的整个研究工作当中仍然可以深切地感受到。他从研究巴金而到研究新时期文学，再到研究二十世纪中国

新文学，研究领域的不断开拓，其动力乃在于他对当代生活的激情。他认为，“一个知识分子，如果对当代生活没有激情，没有热望，没有痛苦，没有难言的隐衷，那么，他的知识，他的学问，他的才华，都会成为一些零星而没有生命力的碎片；文学研究虽然不同于文学创作，但在冷静的学术研究背后，仍然需要精神上的热情支撑。”（《方法、激情、材料》，《书林》，一九八八年第七期）在当代年轻的研究者当中，还很少有人作过这样多少有些“传统”的、直率的表白。

事实上，陈思和的确是把他的这种激情贯注到他的许多研究文章当中的。在这些文章中，我们不时能够感受到一个有着血肉之躯的当代青年的灵魂的搏动，一种在冷静的分析后面所涌动着的热烈的情思。如果我说陈思和兼有学者的冷静和艺术家的激情不知道是不是过分了，不过他的这种激情多半是内在的，而不是外溢的，这就使陈思和终于是个学者，而不是艺术家。陈思和的长文章居多，而且这些长文章不算写得很精炼，但是读起来却不感疲累，这跟他的文章有一种一以贯之的内在的激情，以及由此而造成的一种畅达的文风是有关的。在他的为数不多的研究当代具体作家作品的文章中（除了巴金之外，还有王安忆、莫言、张辛欣等），也贯注着这种激情，表现了一个年轻的研究者对当代作家的爱和知。

四

整整两年以前，我写过一篇关于陈思和的短文——《不畏荆棘的求索者》（《中国青年报》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九日），我说他为自

已开辟了一条充满艰辛的研究道路，不是单凭才气和灵气，而是靠一套实打实的硬功夫，使他的研究到达了一个较高的层次。

两年过去了，现在我面对着案头上堆放着的厚厚的一叠陈思和的研究成果——这里有他前几年与李辉合著的《巴金论稿》（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四月版），有体现他的“史的批评”的《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八七年六月版），还有散见于各种报刊上的、现已结集为《批评与想象》，即将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许多文章……我不能不再一次地赞美这位年轻研究者的勤奋和扎实，他正迈着坚实有力的步伐驰骋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批评研究领域里。陈思和所走的路子，正是我先前想要走，却由于种种原因（主要是由于主观方面的原因）没有走成的路子，我在他身上看到了我想达到却没有达到的东西。当一个年轻的后来者从我身上跨越过去的时候，我不讳言我的心情是很复杂、很不平静的，是欢喜？是惶愧？是妒忌？……可以说都有，但我决没有阻拦他们前行的念头。我虽然没有鲁迅式的“自己肩住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广光明的道路上”的心胸和气量，但我却深知阻拦前行者的命运只能是加速自己的衰亡；因此我对于跨越自己而前行的年轻人总是赞佩的，这甚至使我宽宥了他们身上的缺点和弱点。

鲁迅说：“但青年又何能一概而论呢？有醒着的，有睡着的，有昏着的，有躺着的，有玩着的，此外还多。但是，自然也有要前进的。”（《华盖集·导师》）陈思和固然也有缺点和弱点，但我相信他是属于“要前进”者之列，因此当陈思和邀我为他的《批评与想象》一书作序的时候，我欣然应承了。于匆迫忙乱之中写出的如上的文字，自然还是溢美之辞居多，但我想陈思和是不会因此而昏昏

然的。以他的冷静和成熟，他将能正视自身的缺点和弱点，在他自己所开辟的布满荆棘的研究道路上继续求索，做出更优异的成绩！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三日

于京都天命斋

代序：我与批评（两则）

一、文学批评的位置

每当我读到有关论述文学批评如何指导文学创作，推动文学创作，以及繁荣文学创作的文章，每当我听到有人津津有味地谈论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如何指导、培养俄国古典作家的那些使批评家们引为骄傲的事例，总有一团疑云浮上心间：难道文学批评真的具有指导作家的神奇功能吗？

文学批评的对象是文学、文学家以及文学作品，批评家是借助于文学来发议论，阐述自己的人生观、哲学观与审美观的。批评的特殊之处就在于此。文学作品对于它来说，既是目的又是过程。批评以研究文学的主要表现形式——文学作品为主要任务，但它又无法穷尽它的研究对象，结果它的全部意义与价值则表现在研究过程的运动之中。从这些运动中，批评呈现出自身的美学、魅力以及流派。

说批评无法穷尽它的研究对象，决不意味着对它的蔑视，恰恰相反。批评所面对的是文学作品，作品具有两重意义：一重是它的物质构成——纸张、铅字以及由物质材料所构成的文字符号，这是